

林语堂

大家小集 林语堂集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林语堂约于1936年留影



林语堂7岁独照，摄于福建漳州。



约1904年，林语堂（前排右二）在厦门鼓浪屿
主日学校与同学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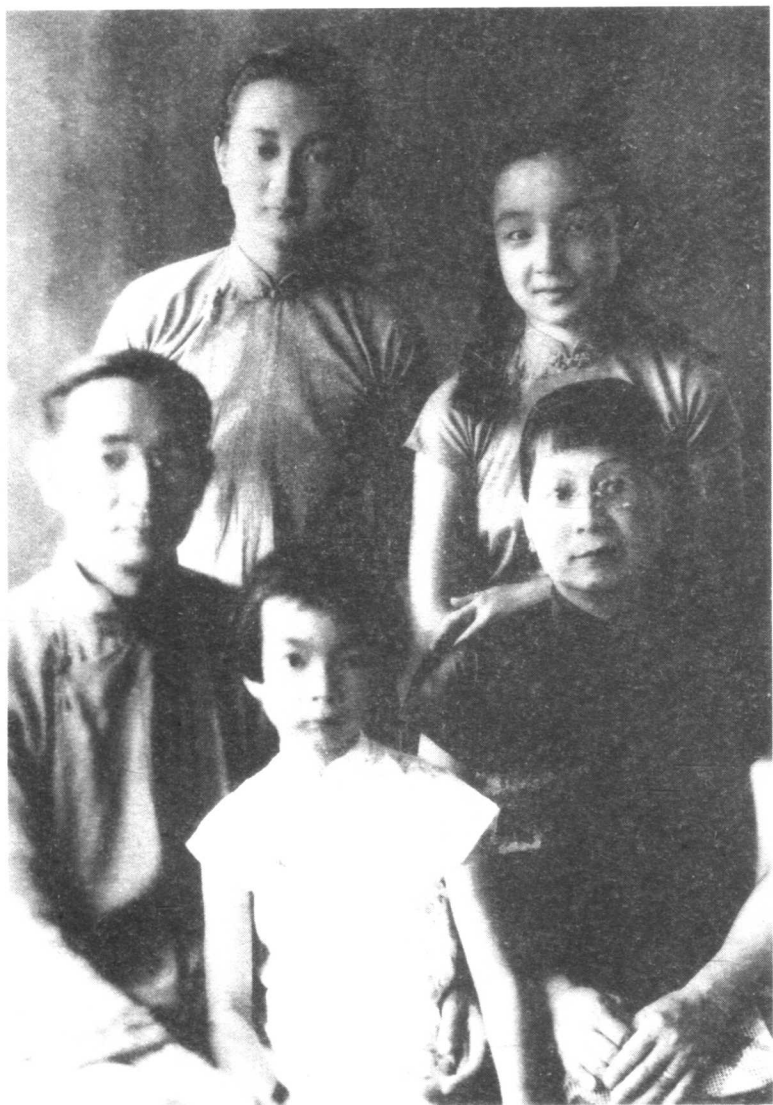
林语堂全家福，后排右二为林语堂，前排右三为父亲林至诚牧师，右二为母亲杨顺命。



约于1910年，廖翠凤（第三排左）任教毓德小学
时与同事合影。



约1937年，林语堂与次女太乙、三女相如、长女如斯。



林语堂全家福，约1939年摄于四川北碚。前排右起夫人廖翠凤、三女相如、林语堂，后排右起次女太乙、长女如斯。



1946年，林语堂完成 30 部 著作后在纽约寓所留影。

大家小集

林语堂集



序

施建伟

1970年7~8月间，国际笔会第三十七届大会在汉城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是“幽默”（Humour）。

美国小说家厄普戴克、法国批评家梅雅、南朝鲜诗人李殷相等著名作家，先后以“幽默”为题作了发言。他们的报告都有相当的学术水平，但听众们却觉得这些发言学术性有余，而文艺性不足，结果使讨论“幽默”问题的会场里缺少了最重要的东西：幽默。

然而，一位中国作家的精彩发言，令人耳目一新，改变了会场的气氛。这位中国作家轻松自如地引证了古今中西的各种幽默现象，畅谈了自己几十年来研究幽默的心得体会。他的题为《论东西文化的幽默》的发言，博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掌声经久不息。

五年之后，也就是1975年，在国际笔会第四十届大会上，这位在第三十七届国际笔会上出尽风头的中国作家，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这位为中华文明争光的中国人就是林语堂（1895~

1976)。

在国际文坛上，林语堂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作家，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用英文写作来向外国人直接介绍中国文化，这是林语堂文化活动的特征。他曾出版过三四十种英文著作，每一部作品通常都有七八种版本，特别是以优美的小品散文笔调撰写的《吾国吾民》(My Country & My People)和《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两书驰名欧美文坛。其中《生活的艺术》从1937年发行以来，在美国已出到四十版以上，英、法、德、意、丹麦、瑞典、西班牙、荷兰等国的版本同样畅销，历四五十年而不衰。1986年，巴西、丹麦、意大利都重新出版过，瑞典、德国直到1987年和1988年仍在出版。1989年2月1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谈到他访问东亚的准备工作时，说他读了林语堂的作品，内心感触良深。布什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

布什的话表明，林语堂至今还在影响着美国人的“中国观”。

然而，在中国的内地和台湾，他却是一位争议极大的人物。褒之者说他是“一代哲人”、“蜚声世界文坛的中国大文豪”；而贬之者则斥之为“反动文人”、“洋奴”等等。我是在八十年代初撰写《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论》的有关章节时，阴差阳错地“误入”了当时还被视为学术“禁区”的林语堂研究领域的。——不好意思，现在的年轻读者也许不相信，我在大学中文系时，是无法（准确地说的不允许）阅读林语堂的著作的，因为学术上的“凡是”派根据某人在特定环境下说的某些话，已把林语堂定性为“反动文

人”。从五十年代起，我们这一代人首先是从鲁迅的作品中知道林语堂的名字。那些有关“打落水狗”或批判“幽默”的片面注释（注：关于这些史料，拙著《林语堂传》等作品中，已作多次辨正）造成了一代人对林氏的第一印象。其实，一般人在五六十年代根本读不到林语堂的原著原文。八十年代初，拿着校党委的介绍信，证明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我才在上图、徐家汇藏书楼等处读到林语堂的一些作品，从这些极不完整的资料中，我惊讶地发现原始的史料与当时文学史的流行观点之间，竟有如此落差。使我确定这是文学史上的一桩冤案的是：刊于《申报》上的一些资料。其一，1934年7月26日《申报》上刊出一篇题为《声讨鲁迅林语堂》的“檄文”，摘录如下：

“……大会提交声讨鲁迅林语堂应如何办理案，决议（甲）发表通电由梅子、高完白、童赤民起草。（乙）函请国内出版界在鲁迅林语堂作风未改变前拒绝其作品之出版。（丙）函请全国报界在鲁迅林语堂未改变作风以前一概拒绝其作品之发表及广告。（丁）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及林语堂两文妖。（戊）警告鲁迅及林语堂迅即改变其作风，否则誓与周旋……”。

如果说，1926年在北京，他们同时被列入军阀的黑名单，证明了鲁迅和林语堂在反对军阀统治的斗争中，是同一战壕里并肩战斗的战友，那么，八年后，在上海，他们又同时被站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立场上的微风文艺社“声讨”，这至少也说明了林语堂和鲁迅一样，被当局认为是反现实反体制的叛逆作家。然而，有的论著，却把当年在“文化围剿”中与鲁迅同时被“声讨”、被“围剿”的对象，说成是“围剿”左翼文艺的“反动的文学派别”，这岂不是颠倒黑白

吗？

其二，1936年10月，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林语堂又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二十位文艺界著名人士一起，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其三，……

于是，我一不小心进入了“雷区”，“林语堂是鲁迅早就下过结论的人……”这是一个极有杀伤力的警告，不少好心的朋友、前辈曾不止一次地提醒我。然而，我铁了心，因为我曾被不公正地扭曲了二十二年，难道能对文学史上明显的冤案熟视无睹吗？

近年来，我的那些有关林语堂的论著，一方面不断得到前辈、同行和读者的鼓励，另一方面也常有人问我：“你是要重新评价林语堂？你是要……”我的回答始终如一：“我只是力图让人们了解真实的林语堂。”

伟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分化。这种分化，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在其觉醒过程中的曲折性和艰难性。如果说，鲁迅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是代表了分化的一种结果，那么，林语堂的复杂经历则体现了分化后的另一种路向。

但是，由于林语堂的影响早已超越国界，所以，若从全球性的视角来评析林语堂的功过得失，那么，林语堂在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我认为主要不在于他在“分化”时的表现，而在于“分化”后，他作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先驱者，为中西文化的交流而在世界文坛上所进行的锲而不舍的努力。

实际上，如果把林语堂的文化交流活动当作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在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一种探索和尝试，那么，也就不拘泥这一探索的积极结果和消极影响各占多大比重——不论是正面的获得，还是反面的缺失，都算是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更新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一笔学费吧！

为了追寻林语堂的足迹，1991~1993年我曾受聘于林语堂故乡闽南地区的华侨大学，当时，形成了一个以华侨大学海外华人研究所为核心的林语堂研究学术群体。虽然，由于人员流动，这学术群体只有短短两年寿命，但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已得到海内外同行专家的充分肯定。

1994年10月我应邀赴台北参加纪念林语堂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幸与林语堂的家属林太乙夫妇、林相如女士等人直接交流，并与林氏在台湾的大弟子黄肇衍、马骥伸夫妇以及台湾的学者专家们就林语堂研究直抒胸臆。我不仅在大会宣读了论文，而且还针对各种尖锐的提问，进行了热烈的争辩。在阳明山上的林语堂纪念馆里，我饱览了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

1995年8月应香港作联曾敏之先生和中华文化促进中心之邀，我赴港作了《林语堂的幽默情结》的学术报告。香港电台也就林语堂研究问题，对我作了半小时的采访报道，此时，正值林语堂诞辰一百周年。因为按公历计算，到1995年才真正是林氏诞辰百周年。因此，山西和福建分别都有纪念林氏的学术研讨会。

从学术“禁区”到目前这样的局面，我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为林语堂研究在近年来取得的成果而感到发自内心的喜悦。

近二十年来，我已发表和出版了有关林语堂的研究论

文、人物传记、随笔杂感，将近二百万字。然而，每次为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从来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也许是徐訏的那句话——“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难写的一章。”——给了我无形的压力。我总觉得，我，或者说我们与这位博学的文化名人之间，有着一历史历史的沟。要跨越这条沟，必须付出时间、精力和勇气。

本书编选了林氏各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散文、随笔、小品、杂文 117 篇。这是解读林语堂的必由之路。

花城出版社在此时此刻出版《大家小集》的系列文集，显示了出版家的眼光，功德无量！具有高度敬业精神的钟洁玲女士把我从漫游世界的旅途中唤回了书斋，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正由于花城的许多朋友的辛勤付出，才会有现在这本集子，在此一并致谢！

2005. 11. 11 于无境斋

2006. 8. 28 修订

序 施建伟 / 1

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 / 1

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 / 3

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 / 6

读书救国谬论一束 / 9

萨天师语录 / 14

论语丝文体 / 36

忆狗肉将军 / 43

读萧伯纳传偶识 / 47

阿芳 / 54

读邓肯自传 / 58

粘指民族 / 68

谈牛津 / 71

冬至之晨杀人记 / 73

谈牛津 / 78

再谈萧伯纳 / 85

萧伯纳一席谈 / 91

谈言论自由 / 95